

最新 欧美畅销惊险侦探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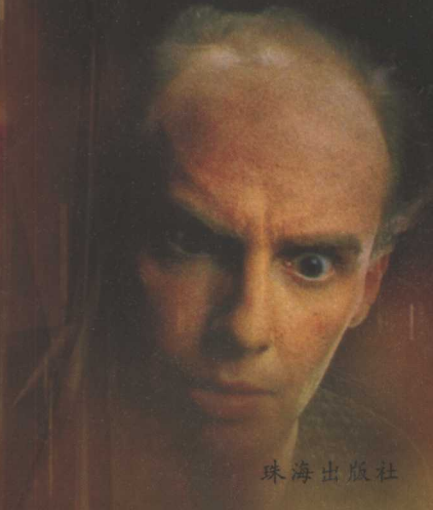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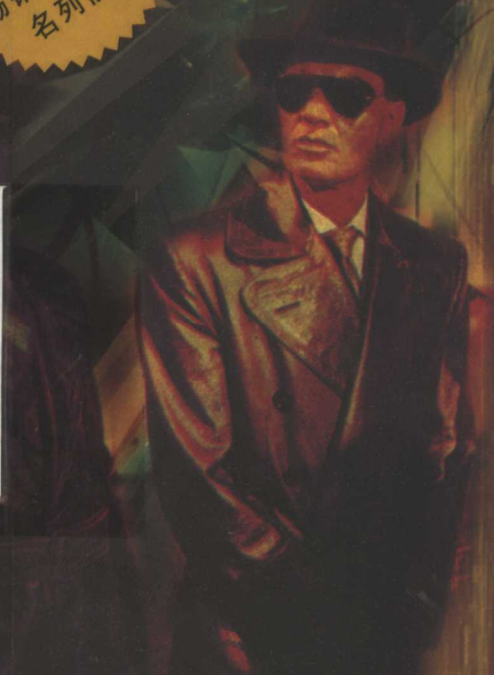
[瑞典]亨宁·曼凯尔 著

舒云亮 译

BRANDVÄGG

防火墙

德国
《焦点周刊》
畅销书排行榜
名列前茅



珠海出版社

I532.45/3

防火墙

[瑞典]亨宁·曼凯尔 著
舒云亮 译

BRANDVÄGG



RA 2011/17
珠海出版社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49864

442850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3-165

BRANDVÄGG © by Henning Mankell 1998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Ordfronts Förlag AB, Stockholm and Leonhardt & Høier Literary Agency aps, Copenhag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防火墙/ (瑞典) 曼凯尔著; 舒云亮译.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12

ISBN7-80689-168-4

I. 防… II. ①曼…②舒… III. 侦探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8244 号

防火墙

亨宁·曼凯尔著 舒云亮译

策 划: 雷良波 终 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雷良波 靳 红

装帧设计: 大 宇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 519002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邮 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 0756-2639346

E-mail: zhCBS@zhCBS.com

网 址: www.zhCBS.com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4 字数: 37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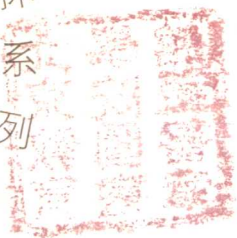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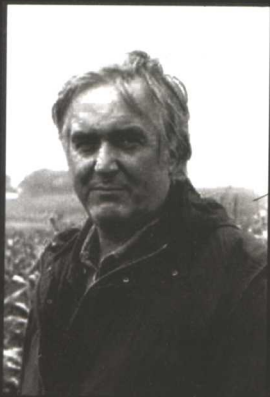
ISBN7-80689-168-4/I·468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畅销
惊悚
侦探
系列





曼凯尔和他的小说

欧美近年风行侦探小说大师亨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的作品。

曼凯尔于1948年出生于瑞典，他在自己的侦探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名叫库尔特·瓦兰德的警长。

瓦兰德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里那些无所不能的侦探形象，他机智勇敢，却又稍稍有些落伍；奋不顾身，却又有许多中年男人的烦恼。

曼凯尔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五种外文，德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甚至买下了整个“瓦兰德系列”。在德国《焦点周刊》公布的前二十位文学类畅销书里，曼凯尔的小说达六部之多，其中《错误的轨迹》等作品已被改编为电影，瓦兰德警长很快就将在银幕上和观众见面。

第一部 催化剂

1

临近傍晚，风减弱了，然后完全停止了。

他站在阳台上。在有些日子里，他能够看到马路对面楼房之间的一片海洋。现在天太黑了。有时候，他架起望远镜去观察其他公寓里亮着灯光的窗户，但他总会产生似乎别人也在观察着他的感觉，于是他就会停下来。

天上星光灿烂。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他想道，今晚或许会有霜呢，虽然对斯堪尼亚地区来说稍微早了些。

一辆轿车驶了过去。他颤抖了一下，回到屋里面去了。通向阳台的门很难关上，需要做一些修整。他把这事记在了放在厨房里的一本需做事宜的便条本上。

他走向起居室，在门口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四周。因为是星期天，该区域相当干净，这使他感到满意。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从一格抽屉里拿起那本厚厚的日记本。与往常一样，他从头天晚上的记载开始阅读。

1997年10月4日，星期六。据国家气象台报告，刮阵风，风速每秒八至十米。天空有碎块积云。6点钟时气温为七摄氏度。2

点钟时气温为八摄氏度。

在此下面，他加了四句话。

今天 C 层空间无活动。没有信息。在提白时 C 没有回答。一切平静。

他打开墨水瓶盖，把笔尖小心地插进了墨水之中。这是他父亲的钢笔，是他父亲早年在托梅利拉的一家银行里当文员时保留下来的。他在日记本上写字时从来不用其他钢笔。

当他写字时，风停歇了。厨房窗户外面的温度计显示气温为三摄氏度。天空很清澈。他记录了打扫公寓用去了三小时二十五分钟这个事实。这比上星期天快了十分钟。

在圣玛丽亚教堂作了三十分钟的沉思之后，他还作了一次短暂散步，去了游艇港湾。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写下了：晚上短暂散步。

他压了压写字板上刚才写下了几行字的部位，擦净钢笔，并盖上了墨水瓶盖。

在合上日记本之前，他瞟了一眼书桌上的那只旧船钟。这时候是 11 点 20 分。

他走出起居室，进入到客厅，穿上皮夹克，套上了一双旧雨靴。他把手插进口袋里，以确信带上了钱包和钥匙。

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在阴影处站了一会儿，并朝四周打量了一下。旁边没人，如同他所期待的那样。他开始往左边走过去，如同他通常所做的那样，穿过赴马尔默的公路，朝那些百货商店和税务局的那栋红砖楼房走过去。他加快了速度，直至他感觉到他那通常顺畅的晚间节奏。他在白天行走得很快，以提高他的心跳速率，但晚间的行走具有不同的目的，这是他尽可能放松、准备睡觉和准备明天来临的时候。

在其中一家百货商店外面，他经过了一位牵着一只德国牧羊犬的妇女。在他的晚间散步时，他几乎总是遇到她。一辆轿车疾驰而过，车上的音乐开得很响。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他想到，所有这些开飙车的人把刺耳的音乐开得这么响，无疑是在永久性地损伤他们的听力。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与那位在外面遛狗的妇女一样无知。

这个想法使他颇为兴奋。他想象着他行使的权力，他有权去除这个社会的那些僵化的和腐朽的行事方式，并开创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全新的人们所未曾预料到的秩序。

他停下来，抬头去看夜空。

世间万物不可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他想到，我自己的人生就同我现在看到的星光是经过多少个光年的旅行那样的不可理解。惟一有意义的是我自己的行动方针，如同二十年前向我提供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的那笔交易。

他继续行走，并加快了速度，因为他的想法正在使他兴奋激动。他感觉到越来越急躁。他们为此已经等待了那么久。现在这个时刻就要来到了，他们将打开那些无形的堤坝，注视着他们的浪潮席卷世界。

但时间还没到，现在还不可能。急躁是他自己也不能容忍的一个弱点。

他转身开始往回走。当他经过税务局时，他决定去位于广场上的那台自动取款机。他把手伸进他放着钱包的那只口袋。他不是要取钱，只是想打印一张账户收支平衡单，以确信账款应该是多少。

他在自动取款机前停下来，取出了他的磁卡。那位牵着德国牧羊犬的妇女早就走远了。一辆满载的卡车在马尔默公路上驶过，很可能是奔赴去波兰的轮渡码头。根据那辆卡车的轰鸣声判断，它的消音器已经坏了。

他把磁卡插入插卡口，输入密码，选择了查询收支按钮。机器吐出他的磁卡，他把它放进了钱包里。他听着打印机运行的呜呜声和咔哒声，脸上露出了微笑。假如他们知道，他想到，假如人们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那张记录着他的账户收支余额的白纸条从打印孔里吐出来了。

他摸索着寻找他的眼镜，然后明白他把眼镜忘在另一件衣服里了。他对自己的这一疏忽感到一阵恼火。

他走到街灯的最亮处去审视那张纸条。

纸条上记载着星期五的取款，以及前一天他的取现。现在他的余额是九七六五瑞典克朗。一切都有条不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先兆。

事情似乎是他被一匹马踢了一脚，导致了突然的剧痛。

他朝前扑倒在地，手里捏着那张白纸条。

当他的头部碰到沥青路面时，他的脑海里有过最后的一次清醒。他的最后想法是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

这时候刚过 199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一午夜。

奔赴夜间轮渡的第二辆卡车驶了过去。

然后宁静再次降临街道上。

2

1997 年 10 月 6 日上午，在于斯塔德市玛利亚街，当库特·瓦兰德坐进他的汽车时，他有点不太情愿。这时候刚过 8 点钟。他驾车驶出城区，心里还在纳闷为什么他说他会去。他从心底里不喜欢参加葬礼，而现在他正是在奔丧的路上。因为时间充裕，他决定不直接去马尔默，而是走海岸公路去斯瓦特和特雷勒堡。他瞟了一眼在他左边的海洋，一艘渡船正在驶近港湾。

他回想起这是他在七年之内参加的第四次葬礼。第一次是他的同事里德伯格，死于癌症，是经过长期的痛苦和折磨后死去的。当时，瓦兰德常去医院探望他，而他则躺在病床上缓慢地走向死亡。里德伯格的死，对瓦兰德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里德伯格在他之前当上了一名警官，他曾经教瓦兰德如何分析隐藏在犯罪现场的信息。

在他开始与里德伯格一起工作之前，瓦兰德一直是一名相当普通的警察。只是在多年之后，在里德伯格死后，瓦兰德才明白他已经成为一个不顽强不息、精力充沛的侦探，而且优秀的侦探。当他处理一项新的刑事调查、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时，他的脑海里仍在与里德伯格进行着长长的、默默地交谈。在缺少了里德伯格的日子里，他几乎每一天都在体验着一种简短的失落感和悲伤感。这种感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然后是他的父亲，死得很突然。他是在洛德鲁普的工作室里倒地去世的。那是三年前。有时候，瓦兰德还是不能相信他的父亲已经不在弥漫着松油和油漆味的工作室里了。位于洛德鲁普的那栋房子，在他死后就出售了。此后瓦兰德曾有两次驾车经过那里，看到新的家庭居住在那里。他从来不曾停下汽车，凑近去看上一眼。他常去父亲的坟头，每次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因此他去得越来越少了。他还觉察到他越来越难以想象出父亲的面容。

一个死去的人最终成了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

然后是斯维德伯格，他的同事，在一年前被残忍地谋杀了。这使得瓦兰德明白他对于与之一起工作的人是如此的缺少了解。在调查期间，他发现了斯维德伯格生前的关系网复杂到他做梦都想象不到。

现在他正在奔赴第四次葬礼的途中，而这一次他并不是非去不可。

她是在星期三打电话给他的，当时瓦兰德正要下班。那是下午晚些时候，他正为手头上一件涉及走私香烟的棘手案子而感到非常头疼。案件的线索似乎通到了希腊警方，然后坠入了云雾之中。瓦兰德已经与德国和希腊警方交流了情况，但他们仍没能抓住走私分子。现在他明白，驾驶那辆装有走私品的卡车司机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货物是什么，但最终他是要进牢房的，起码要被关押两个月。这案子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了，瓦兰德确信，走私香烟每天都在运抵于斯塔德。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终止这种走私活动。

那一天，他还因为与地区检察官的一场争论而搞得很不愉快。那人是替补皮尔·阿克森的空缺的。阿克森在两年前去了苏丹，似乎还不急于回来。每当接到阿克森的来信，瓦兰德总是感到很羡慕。他做出了瓦兰德只会梦想的事情：重新创业。现在，瓦兰德快要五十岁了，他知道虽然他自己还不肯承认，但改变命运的事情已经不会发生了。除了一名警官，他将永远不会有其他命运了。在他退休之前的未来几年里，他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尽可能努力破案并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的同事，但不会有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的事情在等待着他，不会有苏丹。

当他正要穿上西装时，她来电话了。

开始时，他甚至不知道她是谁。

然后他才明白她是斯蒂芬·弗雷德曼的母亲。几秒钟之后，三年前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和孤立的形象回想起来了。在那个案子里，那个男孩把自己浑身上下涂满了美洲印第安勇士那样的油彩，然后出发去向把他的姐姐逼疯和把他的弟弟吓得半死的那些男人复仇。其中一个受害人是斯蒂芬自己的父亲。在看到其中一个最纷乱的场面，看到那男孩跪在他姐姐的尸体旁哭泣时，瓦兰德不禁倒退了一步。他不知道此后发生了什么，除了那个男孩已被送进了一座看管严密的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之外。

现在阿内特·弗雷德曼来电话说那男孩已经死了，他是跳楼自杀的。瓦兰德向她表达了诚挚的哀悼，尽管他感到的也许是一种无助和绝望而不是悲痛的感觉，但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打电话给他。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电话听筒，努力回想起她的面容。他曾和她的位于马尔默郊区的家中见过她两三面，当时他实在难以相信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会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她既害羞又紧张，她总是显得畏畏缩缩的，似乎担心事情会变得更糟。在她的经历中，事情往往变糟了。瓦兰德记得他曾经怀疑她是否沉湎于酒精或靠药物支撑，但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他几乎记不起她的脸容，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完全是陌生的。

然后她告诉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她希望他能参加葬礼。会来的人极少，她是他惟一的亲人，除了她的小儿子扬斯。毕竟，瓦兰德是祝愿他们平安的好人。

他答应了去参加。话一出口他就改变了主意，但这时候已为时太晚了。

后来他曾试图搞清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那个男孩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与斯蒂芬的其中一位医生交谈了。他被告知，在过去的几年里斯蒂芬几乎绝对沉默，并与外界相隔绝。但从楼上纵身跃下、落在医院水泥地坪上的那个男孩全身涂满了勇士的油彩。从那种纷乱的油彩和鲜血中，很难看出被锁在里面的那个少年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但这说明了形成了他的性格的是这个充斥暴力和相当冷漠的社会。

瓦兰德沿着道路缓慢行驶。早上当他穿上西装并发觉裤子与之相配时，他曾经感到颇为惊讶。他肯定已经减轻了体重。自从去年被查出患有糖尿病时起，他已经强迫自己改变饮食习惯，开始锻炼，并且减肥。开始时他搞得过火了，每天要踏上放在浴室里的保健秤去秤上好几次，直至最后他狂怒地把它扔了出去。

但他的医生仍然喋喋不休，坚持认为瓦兰德应该改变一下他那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他那完全不锻炼的状态。他的唠叨最终产生了效果，瓦兰德买了一套运动衣和一双跑鞋，开始了定时的走路。但当他的同事马丁森提议他们一起跑步时，瓦兰德拒绝了。他不喜欢跑步。现在他已经确定了他走路的固定路线，花时约一个小时。从玛利亚街开始，穿过桑德斯科根公园后返回。他强迫自己每星期至少出去散步四次，还强迫自己不吃他最喜欢的汉堡包。这样，他的血糖指标降下来了，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一天早晨，当他在镜子前面剃胡子时，他注意到他的双颊又陷进去了。这如同在脱去一层脂肪和坏皮肤之后，他的原先面孔又恢复了。他的女儿琳达在上次见到他时，为他的变化而感到很高兴，但在警局里，没人对他的面容做出过任何评论。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互相视而不见，瓦兰德想道，我们一起工作，但我们互相视而不见。

瓦兰德驾车驶过了莫斯比海滩。时值秋天，海滩上空荡荡的。他回想起六年前曾有一艘载着两具男尸的橡皮艇漂到了这里的海岸上。

在一个念头的驱使下，他踩下制动把汽车调过头来。他有充裕的时间。他停好车走下来。外面没有风，气温差不多是零上二度。他扣上大衣纽扣，沿着沙丘之间的弯弯曲曲的土路走向海边。海滩上虽然空荡荡的，但沙中留有人、狗和马的痕迹。他放眼望去，一群鸟排成一种队形正在飞向南方。

他仍然记得他们是在何处发现那些尸体的。那是一次艰难的刑事调查，把瓦兰德引向了拉脱维亚。他在里加遇见了柏芭。她是拉脱维亚一名警官的寡妇，丈夫曾是瓦兰德所认识的和所喜欢的朋友。

然后他们开始见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以为这事会有结果，她会愿意移居瑞典。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找房子了，后来她忽然消失了。瓦兰德妒忌地认为她一定是遇上了另一个男人，他甚至事先不通知她突然飞到里加以便给她一个惊喜。但那里已经没人了，剩下的只有对柏芭的疑虑，怀疑她已经嫁给了另一个警官并离开了她的家乡，她在那里曾经有过一份薪酬不高但声誉较好的工作。

这事就这样结束了。

瓦兰德沿着海滩行走着，他明白自从他最后一次与她谈话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她有时候仍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但他从来没能抓住过她。当他走近或伸手去触摸她时，她不见了。他问自己，他是否真的想念她。现在他的妒意已经消失了；在想到她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他再也不会感到难过了。

我思念这位伴侣，他想道，与柏芭在一起，我战胜了连我自己也没察觉到的孤独。

他回到了汽车旁。我应该避开空荡荡的海滩，他想道，它们会

使我感到失落。

曾有一次他去北部吉尔兰一个遥远的地方躲避现实生活。他是因为心情极度压抑而去度病假的，当时他曾经认为他再也不会作为于斯塔德的一名警官回到工作岗位了。那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情，但他仍能追忆起使他极为惊恐的细节。这是他永远不想再次经历的事情，那种凄凉的、波浪汹涌的景色似乎唤醒了他的恐惧。

他坐进了汽车，继续驶向马尔默。他不知道正在来临的冬天会是什么气象，会下很多的雪或光是下雨。他也不知道他在11月的一周休假期会做些什么。他曾经与女儿琳达说起过要坐飞机去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次度假将由他请客。但她仍在斯德哥尔摩学习，她说她真的离不开。他努力思索是否能叫上其他旅伴，但没能想起任何人。他几乎没有朋友。斯顿·维登也许会跟他一起去，他在于斯塔德郊外的一个农场里养马，但瓦兰德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旅伴。维登经常喝酒，而瓦兰德正在尽力戒酒。他可以邀上格特鲁德，他父亲的遗孀，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之间有那么多话可交谈吗？

没有其他人。

他将逗留在家里，用那笔钱购买一辆新车。那辆标致轿车已经老旧了，已经开始发出稀奇古怪样的声音了。

刚过10点钟，他进入了罗森加德的郊区。葬礼定在11点举行。那座教堂是一栋现代化的建筑。附近有几个男孩在对着水泥墙踢足球。他们共有七个，三个是黑人。另三个看上去也像是移民的后代。最后的一个男孩脸上长有雀斑，头上是一团乱糟糟的金发。这些孩子们在兴高采烈地玩着足球，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有那么一刹那间，瓦兰德很想加入到他们中去，但他留在了原地。一个男人从那座教堂里走出来，点上了一支香烟。瓦兰德从汽车里钻出来，朝他走了过去。

“斯蒂芬·弗雷德曼的葬礼是不是要在这里举行？”他问道。

那人点点头，“你是他的一位亲戚吗？”

“不是。”

“我认为不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参加葬礼，”那位男士说，“我想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是的，我知道。”瓦兰德说。

那人低头去看他手中的香烟。

“像他那样的人死了更好。”

瓦兰德感到有些恼火。

“斯蒂芬还没满十八岁呢！那么年轻的人最好别死。”

瓦兰德明白他在叫喊。抽烟的那个人奇怪地看着他。瓦兰德恼怒地摇摇头转过了身体。这时候灵车抵达了，那具棕色的棺材卸下来了，上面只有一只花圈。我应该买一束花，瓦兰德想道。

他朝那些孩子们走过去，他们仍在踢足球。

“你们谁知道这里附近有花店？”他问道。

其中一个男孩指向远方。

瓦兰德取出钱包，从中抽出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

“去给我买一些花，”他说，“玫瑰花。快点回来。我会给你十克朗，作为跑腿辛苦钱。”

那男孩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但接住了钱。

“我是一名警官，”瓦兰德说，“一个很厉害的警官。如果你拿着钱逃走，我会抓住你的。”

男孩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没穿警服？”他操着不熟练的瑞典语问，“你看上去不像警察。起码不像是个很厉害的。”

瓦兰德向他出示了警徽。那男孩审视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撒腿出发了。其余的孩子继续玩足球。

他很有可能一去不复返，瓦兰德阴郁地沉思着，公民丧失对警察的尊重已有很长时间了。

但那孩子带着玫瑰花回来了。瓦兰德给了他二十克朗，十克朗是给他的辛苦费，另十克朗是作为给他返回来的报酬。过了一会

儿，一辆出租车驶过来停下了，斯蒂芬的母亲下了车。她已经老了，瘦得像是患了病似的。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依附在她身旁。他长得很像他的哥哥。他睁着一双恐惧的大眼睛。从那时起，他仍然生活在惊恐之中。瓦兰德走过去招呼他们。

“就只有我们和那位牧师。”她说。

他们走进教堂。那位牧师是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棺材旁边看报纸。瓦兰德发觉阿内特·弗雷德曼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臂。

他明白了。

牧师站起身来，把报纸放在了一边。他们在棺木右边坐了下来。她仍然挽着他的胳膊。

她先是失去了丈夫，瓦兰德想道，布约恩·弗雷德曼是一个粗暴的、令人讨厌的男人，曾经常打她和吓唬孩子们，但他仍然是她的丈夫和她孩子们的父亲，他后来被他自己的儿子谋杀了。然后，她最大的孩子路易丝死了。现在，她来到了这里，将要埋葬她的儿子。她还剩下什么呢？半条命？

有人在他们身后走进了教堂。阿内特·弗雷德曼似乎没有听到，要么是她正在尽力控制住自己，以致她不能把注意力移往别处。一位妇女正沿着通道走过来，她与瓦兰德年龄相仿。阿内特·弗雷德曼最后抬起眼皮朝她点点头，那位妇女在他们后面相隔几排处坐了下来。

“她是一位医生，”阿内特·弗雷德曼说，“她名叫阿格妮特·马尔姆斯特隆。在扬斯感觉不适的时候曾诊治过他。”

瓦兰德熟悉这个名字，但他花了一分钟时间才回想起是阿格妮特·马尔姆斯特隆及其丈夫向他提供了有关斯蒂芬·弗雷德曼案子的最重要的线索。有一天夜晚他曾通过斯德哥尔摩电台的帮助与她谈过话，当时她在外海的一艘游艇上。

瓦兰德听到了风琴的音乐声，尽管他没看见任何弹风琴的人，是那位牧师打开了一台录音机。

瓦兰德纳闷为什么他还没有听见教堂的钟声，难道葬礼不是由

教堂的钟声鸣响而开始的吗？他的这个想法被阿内特·弗雷德曼对他手臂的攥紧感所替代了。他朝她身边的那个小男孩投去了一瞥，像他那种年纪的孩子应该来参加葬礼吗？瓦兰德认为不应该，但那男孩看上去相当镇定。

音乐声消逝了，牧师开始讲话，他开始提醒他们基督的话语：“让小家伙们到我这里来吧。”瓦兰德把注意力集中到放在棺木上的花圈上，数着花朵以使他的喉咙里的肿胀不致加大。

仪式很短，然后他们走近棺材。阿内特·弗雷德曼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似乎她正处在赛跑的最后几米距离。阿格妮特·马尔姆斯特隆站在他们身后。瓦兰德转向那个显得不耐烦的牧师。

“为什么没有教堂的钟声？”瓦兰德问他，“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有钟声的鸣响，而且不应该再播放录音。”

牧师迟疑地点了点头。瓦兰德不知道如果他出示他的警察证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开始朝外走去，阿内特和扬斯·弗雷德曼走在其他人的前面，瓦兰德向阿格妮特·马尔姆斯特隆打招呼。

“我认出你了，”她说，“我们从未谋面，但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的脸。”

“阿内特要我来。她也打电话给你了吗？”

“没有。我是自己来的。”

“她以后会怎么样呢？”

阿格妮特缓慢地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她已经开始酗酒，我不知道扬斯以后怎么过日子。”

这时候，他们走到了前庭，阿内特和扬斯在那里等待着他们。教堂钟声敲响了。瓦兰德打开教堂大门，最后看了一眼那具棺材，几个男人已经在通过一扇边门把它抬出去。

突然他的眼前亮起一次闪光，一名新闻摄影师等在教堂外面。阿内特·弗雷德曼用双手捂住了脸面，摄影师放过她要去拍摄那个小男孩。瓦兰德伸出手臂去阻止他，但摄影师动作相当快，他已经